



蒋介石御用杀手

军 统

作者 张寒清

海南国际出版社出版发行

蒋介石御用杀手 军 统

作者 张寒清

海南国际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空印刷厂印刷

850×1168 32开本 13印张

1997年11月第一版 1997年11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3000册

ISBN7-5430-14000-9

定价:20.80元

内容提要

中国的 30 年代,由戴笠组织发起的国民党军统情报局为当时中国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特务组织,专搞暗杀、绑架、刺探情报等白色恐怖,连国民党的高级官员也受制于“军统局”。一旦得罪“军统局”或丢官或丧命,“军统局”风靡一时,被称之为蒋家王朝的御用杀手。本书以权威性的资料揭示了这一血腥内幕。当时的中国各省市国民党党部的书记长几乎都成了“军统局”的人,他们形成了一张巨大的统治网,在控制人民的进步活动和镇压共产党等方面犯下了令人发指的罪行。

那是 20 年代初期，一个瘦弱的江山青年来到海滩，经家乡人介绍，在上海的一家证券物品交易所当跑堂的，这个江山青年没想到，这家证券物品交易所就是国人所仰慕的孙中山为期待措革命经费所创办的。在这里他认识了孙中山同盟会的载季陶、陈果夫等人，而出身名门的陈果夫很瞧不起这个衣着寒酸的江山小子，常常骂他“小瘪三”。喝呼他买这买那，这个江山小青年很是反感他。

有一天，陈果夫陪同一位客人来交易所谈生意。江山青年过来倒茶时，不经意将水撒到陈果夫身上，陈果夫气得直骂他“小瘪三、小瘪三”。

“果夫，怎么能这样以衣帽取人？赶快把茶钱付给人家。”这江山青年正怒不可遏地要回敬陈果夫几句，就听见边上的客人用训斥的口吻在责备陈果夫。

江山青年这才发现，这位客人不过 30 多岁，长得一表人才。江山青年顿时对此人肃然起敬，原来此人就是后来决定中国历史命运的蒋介石，而这个江山青年便是建起中国最大的特工组织的戴笠。这也许是就是人们所说的缘分吧，最后，一个决定着另一个的命运，一个忠实地效忠于另一个，谁离开谁也无法组成这个世界上庞大的特工组织。

然而，命运好像有意折磨戴笠似的，善于抓机遇的戴笠尚未来得及与蒋介石多接触几次，蒋便匆匆南下广州了，他哪里知道蒋介石是因受到粤军内部的排斥而郁郁不得志，所以他到上海搞证券交易所捞钱来了，不想，他由于股票交易失败，负债累累，

又跑回广州去了。蒋介石临来时，交给他一个条子，让这个小伙伴去投上海滩的斧头帮首领王亚樵。王亚樵与蒋介石同是孙中山的同盟会员，他见到蒋的手条，自然对戴笠显得格外亲热。王不仅是斧头帮的首领，还是安徽旅沪劳工会的会长，仅这个工会就有会员一万多人，会费也不少，王级他的会员发生活费，自然也有戴笠一份。后来王亚樵当浙江别动队司令，便封戴为纵队长。同时也封了前来投他的胡宗南、胡抱一为纵队长。而且四人还来了个桃园四结义，焚香歃血，结为金兰。不久，王亚樵的浙江别动队被直系军阀打败，王亚樵又写信介绍戴笠去投考广州黄埔军校。但是，此时的戴笠已经跟王亚樵学会了暗杀与绑架。可以说戴笠是从王亚樵的斧头帮开始特务生涯的。王亚樵来了进一步扶持自己的把兄弟戴笠，推荐并资助他考入黄埔军校。使戴笠从此投入到蒋介石的嫡系黄埔系之中。那时候，国民党除了在中央党部有过调查科这一特务机构外，还没有形成以黄埔学生作中心的特务组织。只是以学生兼作特务活动。自1926年起至1933年特务处成立时为止，戴笠确实是如同他自称的“跑单干”，经历了八年的钻营，因此他常常埋怨是没有衙门的苦差差事不是人干的。每当他亲自递送情报时，不论是拦车或到老头子（即蒋介石）的办公室及公馆，每每受其主子身边人员（警卫、司机、娘姨等）的白眼，自惭形秽。最刺痛他的是“小瘪三又来了”一语，他引为奇耻大辱。戴后来发迹了，还要拉拢这些人，每逢过年过节，仍是大包小包的去贿赂其主子左右，由门房、警卫，直到司机、娘姨、厨师等等，不过是为了显示自己有作为，由“小瘪三”换到了“戴科长”这个无上光荣的头衔，他瞒着老头子低三下四赠金送礼，还是提心吊胆的。

那时，在蒋介石身边“跑单干”做特务的，并不止戴笠一人，牌子最老的要算蔡劲军、胡靖安等人。蔡劲军是黄埔军校一期学生，胡靖安是黄埔二期学生，两人都是最先取得待人参谋、副

官一类的职位，然后才“跑单干”做特务的。戴笠是黄埔六期还不曾正式毕业的学生，见了蔡、胡如见顶头上司一样，毕恭毕敬，当然蔡劲军、胡靖安并没有防范戴笠会爬在他们的头上。后来蔡调上海警察局长时，戴多次看过他，蔡劲军从来就不回拜。胡靖安自称为戴笠望都难以望见的顶头上司。后来胡靖安失宠于蒋，竟手令交戴看管，一直再爬不起来。有人说蔡劲军的海南岛人，胡靖安是江西人，而戴笠是浙江人，因是借助了蒋介石的黄埔门生胡宗南的关系爬上去的。由于胡宗南经常在老头子面前说戴笠的对话，而使他越来越得宠于蒋介石。他知道蒋介石是靠黄埔打天下，把黄埔视为命根子，所以，他紧紧抓住胡宗南这块黄埔的“招牌”，把它当成手中降魔伏妖的符。

1926年7月1日，广东国民政府发布了北伐宣言。戴笠自己说，从那天得校长手谕离校，随东路军北上，入闽浙转入沪宁。他进入江浙境内，打流的朋友很多，米汤定的情报（米汤写的情报，用碘酒一涂，字迹就显示出来了）也就多了。这为他取得蒋介石的重用奠定了基础。

北伐期间，戴笠还北上到过北平、天津、太原、西安、郑州、开封、徐州重要城市。戴笠觉得北洋军阀的情报容易做，北洋军阀的大头老粗多，下面的老粗更多，文盲，无常识，轻信谣言，贪图小便宜，等等。因此，他跑遍了华北五省，为北伐立了大功，自此以后，凡是内战都少不了戴笠这个脚色。

为此蒋介石特赐给的墨宝“艰苦卓绝”四个字。因此，他时常自诩是“艰苦卓绝”四字的踏实服膺者。这个时期，戴笠极力投靠胡宗南。他与胡宗南曾有一小插曲。当年戴笠出来投奔上海滩青红帮时，到了穷困潦倒的地步。衣服脏了，跳到水塘里洗一洗，然后，再晒上崖上，自己则泡在水里不敢出来。有一次了正泡在小塘里洗衣裤，一群学生把他的衣服当破烂收拾走，任戴笠怎么喊学生就是不听。这时学生们的教师胡宗南到蒋介石面

关要人要钱，由于胡宗南向蒋介石张了口，蒋碍于面子，开始给他活动经费，允许他发展人员。

随着戴笠势力的膨胀，逐渐形成了以戴笠为核心的十人团。即：张炎元、周伟龙、唐纵、徐亮、马策、胡天秋、梁干乔、王天木、郑锡麟等九人都是黄埔学生，另外加上一名勤务兵许某某共十人，号称为十人团。十人团之得名是后来特务们奉送的，并没有谁如此册封过。

戴笠虽然时时以黄埔取悦于蒋介石，但做为一个内行的特工他心理也明白，搞一个特务组织，清一色的黄埔学生，有如作茧自缚，是行不通的。因此，他的手法是将黄埔学生摆在主脑机关及外勤大单位做骨架，摆级校长看。为了取悦蒋介石，他还十分注意用不同口语来对待不同的对象。对蒋介石“老头子”、“校长”、“领袖”、“委座”，他在不同的场合用不同称呼，四种称呼是有分寸的，决不令人不快。他称呼“老头子”是用于对平行地位的人说的；“校长”是对清一色的黄埔同学用的；“领袖”是纪念周以及吸收特务入团宣誓，呀天各特务干部训练班的精神训话时用的；“委座”是夹在俯视的称呼中并用的。

由于戴笠的多方努力，使蒋介石看到了特务组织对他的统治越来越重要。甚至到了遇战事动辄先派特务的地步。

“九·一八”事变以后，全国工人、农民、学生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掀起轰轰烈烈的抗日家国运动。国民党的各地省市党部被包围，人员被殴打，这时的蒋介石，感到惶惶，他想的是如何把共产党的运动压下去。一开始他想学习苏联对反革命作斗争的组织形式——格柏乌（政治保卫局）来为他的政权服务。但他有一个特点，即在某些重大问题上不直接命令他的爪牙去干，而是用冷酷骂人的方式，逼着他们揣度他的心理，想出办法来迎合他的意图。

1931年底，他在南京召集了架衷寒、桂永清、郑介民、邱开

基、康泽和戴笠等人开会，在会上，他很难过地产生：“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压迫我们，共产党又这么捣乱，我们党的精视完全没有了，弄得各地的省市党部被围的围、被打的打，甚至南京的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都被包围；我们的党一点力量没有，我们的革命一定失败！……”他讲完后，没要求到会的人发言，就散了会。会后这些“不中用”的学生反复研究了蒋介石的心思，可谁也没想法来。

两天后蒋又召开第二次会议，蒋又把上次的话重复一遍，又这样不了了之。四天后，蒋介石第三次叫这些人去开会，讲的语气比上二次重多了：“我的好学生都死光了，你们这些不中用！”这时贺衷寒站了起来，泪流满面的说：“时局虽然很困难，只要我们团结，还是有办法的。”蒋介石一听，觉得这些不中用的学生还有点头脑，就一面骂，一面顺水推舟地再往下逼，“你们怎样能团结得起来？今天团结，明天就要闹意见。好吧，你们试试也可以，我想：我们要有像苏联的那种‘格柏乌’的组织就好了。我们今天的力量是够的。”一向善于领会领袖意思的戴笠站了起来，说：“就我所知，苏联的‘格柏乌’是它政府的一部分，是挑选最忠实最干练的党员去组织的，在各地还受当地党的监督。”蒋介石不再骂了，中是叮嘱一句：“我们慢慢研究吧。”便走了。

于是，复兴社就这样出笼了。然而，蒋介石建立复兴社的真实目的是想成立特务组织。在这个特务组织领导人的人选上胡宗南再次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胡宗南当时自封是复兴社的后台老板，他以自己的政治名誉向蒋介石保荐戴笠。而蒋介石对一天他叫复兴社的书记长贺衷寒通知戴笠来见他，戴笠不知何事，诚恐诚惶地来到蒋介石的别墅：

“报告校长，学生戴笠奉命来见校长。”

“嗯，”老蒋抬头看了看，鼻子里哼了一声，又低下头接着写了几个字，这才合才卷宗，靠在太师椅上，毫无笔意地看着垂手

恭立着的戴笠，说道：“我叫你来，是想讲讲特务处的工作，重要一环，特种工作人员应该是革命的灵魂，是领袖的耳目。现在已有人保举了站个人，我认为只有你才适宜主持此项工作。”

戴笠毕恭毕敬地双腿一并，立正道：“感谢校长的栽培！我怕做不好这项工作。”

“为什么？”

“团做中，许多人是我的老大哥，我怕……”

“这个不要紧。”老蒋目光温和地看着他，语气亲切地说：“现在就是你有没有决心的问题。你在这方面的能力我是清楚的，只要有决心，事情就一定可以做好的。另外，我还准备叫郑介民和邱开基做你的副手，并设侦察和执行两个科，这个……这个……再调拨高道并洪公祠后院的一幢二层小楼归你们用。”

听了老蒋这一设想，戴笠科有些受宠若惊。他清楚，郑介民、邱开基都留过学，且都是黄埔二期和三期的前辈，学历和资历都超过自己，可老蒋让他们做自己的部下，这对自己是多么大的信任啊！想到此，他突然打了个立正，信誓旦旦地说：“校长放心，学生的这颗脑袋从些刻起就拿下来了。”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说，这个工作干得好，头可能会被敌人杀掉；干得不好，就当然要让领袖杀掉喽！”他番话的弦外之音就是：自己将来以性命来报答领袖的知遇之恩。

于是乎，蒋介石的军内特务机构——复兴社特务处，就这样出笼了。

这是蒋介石学希特勒搞法西斯组织的秘密名称，公开名称是“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二处”，第一处属国民党中党部，处长是徐恩曾。军委会调查统计局长是陈立夫，是个挂名的局长，实际上是蒋介石直接控制的。

复兴社特务初成立时，在南京鸡鹅巷 53 号办公。鸡鹅巷，

是南京一条普通的小巷，单车单行勉强可以通过。53号是幢旧式平房，前后两个院子，共有二十多个房间。尽管还不太尽如人意，前后两个院子，共有二十多个房间。尽管还厌太尽如人意，但戴笠总算有了个衙门。从外表看，53号是一幢普通公务员住宅，所不同者，门内有带枪的便衣人员看门，不时有小汽车、卡车出出进进。来往的人员，有衣冠楚楚的上流人物，有气势汹汹的彪形大汉，使人猜不透这是机关，这是什么公馆，绝不会想到这所幽静的庭院，是一个以杀人而闻名于南京的魔窟。

戴笠没有辜蒋介石的信任，他利用复兴社特务处长的地位，先与张学良的机要处长黎天才交朋友，进而结拜成把弟兄。通过黎的关系，又和张学良交上了朋友。张把洪公祠一号幢独立的大片花园平房，交给戴笠作复兴社特务处办公处所。这座独立的老式花园平房，占地约60亩，有两个大厅和大小一百多个房间，另有东西两个大广场。洪公祠一号的北向大门是唯一的出入口，东面为明瓦郎，南面为秣陵路，西面为丰富路，北为洪公祠小巷，四面有高墙团团围住，成为一座与世隔绝的特务机构。

为了防止树高易藏“飞贼”，故不准种树，间或种几片铺地花坪，显得非常单调冷清。东广场是网球场，是特务处唯一的娱乐场所。没有图书馆，也没有阅览室，各科股订有《中央日报》，进步报纸一律不订，更不准看。没有医务室，也没有医生，仅总务科有红药水和碘酒。但有一间比较漂亮的理发室，内有七八名年轻的女理发员。据说外面理发不安全，这里既稳当可靠，又不收钱。于理发室就成为众人说说笑笑、追逐游戏的场所。有几个黑暗的小房间，里面有浴盆，夏天能用冷水“冲凉”，科天得掏腰包上澡堂。

特务处对工作人员采用终生奴隶制，相互美其名曰“同志”。当时吸收一个人，一看他有无狭隘的爱国思想，二看他恨不恨共产党，三看有无一技之长。发现合格，就向你宣讲南京政府与蒋

介石的“德政”，如你表示同意，就是一步联络、欺骗、拉拢、收买，最后拉你参加特务组织。参加时首先填写祖宗三代的详细履历表。经上级批准后，由介绍人向所属单位正式申请。介绍人对被吸收的新成员，到一个着蒋介石照片的房间，面对照片肃立，举手宣誓忠于蒋介石，接着人事干部向新成员握手祝贺。参加特务组织，一无任何证明，二无任何文件，只是在人事部门和工作单位具名而已。如在外单位工作的，有单位的职员证；在局本部工作的，发级局本部的出入证。出门时交门卫保管，进门时交还，如超过规定时间不回，门卫把出入证送督察室拟处，如多次超过时间，就有收回出入证，被罚“禁足”的危险，严重的还要关禁闭。

特务处对全体员的管理，总的说来有三点：一是剥夺自由活动时间。规定白天工作八小时，夜晚二小时，把全体员人员整日整夜关在大牢笼中，使之没有参加社会活动余地。二是每日轮流休息半天，午饭后到须先请假，假条交门卫，才能出门；到时不归，门卫便把假条和出入证送给督察室拟处，凡家住南京的，休假与在外宿假须排在同一天；如请事假当晚不能归来，须补请外宿假；单身汉一律不准请外宿假。

凡工作人员，均由督察发级一个二寸长、二寸半宽、有照片和单位名称的蓝布面证，无机关名称，只有号码，出门时交级门卫，回来时交还，除此外别无用处。特务们出门以后就无任何证件了，连旅馆也住不上，工作人员自叹：“我们都是榜上无名的黑货。”戴笠却说这是“无名英雄”。

特务处不准会客，不准暴露办公地址，通信要用“鸡鹅 53 号”，或由程阁老巷 33 号转交，电话号码要保密，家属偷打电话，督察室知道后，有受警告的危险。

特务机关的督察制度，是戴笠用以副迫工作人员为他卖命的办法，他要大家为他掌握组织，保守机密，防奸（指中共）。督

察分三种：一是秘密督察。由督察室挑选工作积极而被认为是政治可靠的工作人员担当。这是督察室依照戴笠的指示秘密干的，只有督察室和戴笠知道。他们的名字，人事室，会计室都不知道；二是周督察。每周轮流更换，由单位负责人从工作人员中物色人选，在日常工作与生活中监视每一个人的思想行动，秘密汇报督察室。这种督察者虽由单位负责人挑选后通过督察室登记，但他们的汇报不经过负责人，以绝密件送督察室；三是以江山特别多，文化低，待遇低，但占着军统的机要单位。戴笠利用这批人监视工作人员，他们说江山话，别人不懂，自成派系，工作人员知道他们是暗探，都敬而远之，无形中使其孤立。

复兴特务处自1932年成立到1934年为草创期。1934年蒋介石早期的特务曲干郑文仪，因南昌尺机场纵火案和北平蓝衣社（即复兴社）负责人余洒度因贩毒案，加之此二人是湖南人，都被认为不可靠分子，蒋介石下手令，将郑文仪领导的各地行营调查科的组织，以张毅夫为首的各级成员，全交戴笠的特务处接管，特务处组织扩大了，人员增多了，鸡鹅巷53号房子容纳不下，就迁到洪公祠一号办公。这时，特务处下设书记室：室有人事股股长李肖白；会计股股长徐人骥。督察股股长刘培初，兼军事通讯组组长。译电人员数人，未成立正式组织，直接由书记领导。

此外，加设四个主管业务的科。

第一科是情报科长攻新民。这是特务处的重点。下设：华东股，股长程一鸣；华中股，股长肖漫留；华北股，股长郭履舟；西北股，股长霍立人；华南股，股长严灵峰；国际股，股长陆遂初；统计股，股长何芝园。

第二科编制为总务科，实际并未成立，仅有一个股长。

第三科名为司法行动科，实际上行动由戴笠亲自抓，司法由余铎抓。

第四卫生部科长魏大铭，该科和电台在洪公祠办公，人数冠各科之首，是个独立的秘密单位，禁止与其他单位人员往来。

交通科科长胡子萍，在鸡鹅巷办公。

这是戴笠特务衙门的概貌。

外勤单位上有上海、香港、南京三个区。各省设有站，四川、新疆、东北无具体组织，只有个别通讯员。海外的日本、朝鲜、美国、德国、意大利各一个，“七·七”事变时，共约2500人。

特务处外勤单位通过各种渠道送来的情报，全交第一科，按地区分级各股处理。承办的科员或股长，根据报告的内容，拟出处理意见，重要的报蒋介石和戴笠，经科长批字后交统计股缮写，由交通科送到蒋介石手中。如果是汉奸与左派的重要活动，需要采取行动时，股长拟“制裁”（指暗杀）或者监视、密捕（指绑架）等办法，经科长批字，交戴笠审阅、视情处理；有的报蒋介石批准；特别重要的，戴笠拟具体行动计划，戴笠批准后，即照计划执行。执行暗杀或绑架计划时，习惯办法是：分一线二线或三线。第一线打先锋，第二线监视兼策应，第三线在幕后指挥。一个组织庞大而严密的特务组织就这样出世了。

然而，戴笠这个衙门的太爷椅尚未坐热，便接到了蒋介石的紧急传呼。戴笠惶惶直奔中山陵蒋介石官邸。

二

戴笠一进蒋介石的办公室，正遇上蒋介石拿着电话骂人：“娘稀皮，马上把那家报馆约我封了、封了，找人给我砸了，让青帮的人干。”啪，电话扣了。蒋介石见戴笠进来，把一份《文汇报》摔到戴笠身上“你看看，这种报纸你们也让它出，在你们眼皮子底下发行，你们竟能容忍……”

戴笠拿起报纸一看。一行醒目的大字：“再论‘四·一二’大屠杀与中国之人权”文章落款是杨杏佛。这个人早已是戴笠特务处控制的对象，而且还叫人给他送过一封带子弹的恐吓信。这个人曾留学美国哈佛大学。1925年随孙中山北上。任秘书，后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东南大学工学院院长。1932年底，他与宋庆龄、鲁迅等在上海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他担任了副会长兼总干事。同盟的宗旨是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援助革命者争取议论、出版、结社、集会等自由。杨杏佛了为实一这一目的。1933年春，他到华北等地进行活动，在北京设立了分会。他不但到处宣传人权保障同盟的神圣任务，还针对蒋介石种种蔑视人权、无法无天的做法进行斗争，极力主张停止内战，一致团结抗日。蒋介石对于宋庆龄、杨杏佛等人组织这一同盟及他们的活动十分恼火，他要戴笠不惜一切代价，迫使同盟停止活动。重要的是戴笠直接对宋庆龄下毒手，顾忌比较多。这些天来他一直琢磨杀掉一个“适当”的人来对宋庆龄和其他造成恐怖和威胁。看了这张报纸后，戴笠顿生杀人恶意。

想到此戴笠啪地一个立正：“报告校长，学生这几天来就想向偶然性报告，除掉同盟的总干事杨杏佛……”

蒋介石那双怒火中烧的眼睛这才多少温和些，他没有表态，只是不置可否地哼了一声“这个……这个……你再研究研究吧，去吧……”戴笠知道，委员长对他的报告并不反对。于是他开始着手布置了。

此时的杨雷佛已连续接到了特务寄给他的几封恐吓信了子弹，一再警告他。但真正敢对他下毒手，杨杏佛完全没有料到，更想不到戴笠已奉命开始了杀害他的准备工作。

特务们先侦察了杨的每日行动，了解到杨本人住在中央研究院楼上，爱好骑马，在大西路了两匹骏马，早上有空便去大西路、中山路一带骑马驰骋一两小时。特务们认为在这个时候这

个地段对杨进行狙击机会最多也最有把握。特务们正进行狙击杨的准备时，蒋介石表示不同意这么办，因为把杨杏佛镣在租界以外的地区，既达到威吓宋的目的，还可能引起各方面的指责，增加国民政府的麻烦。他坚持一定要在租界内宋的寓所附近执行，这样即可显示特务和办量，威胁宋庆龄先生，又可以不负破案责任。戴笠只好改变计划，决定在中央研究院附进行布置，准备趁杨外出散步或去宋寓所途中执行。

当时那一带均系住宅区，来往的人很少。戴笠于6月初亲往上海指挥布置，他的寓所就在法租界枫林桥附近。负责执行暗盯的是华东区行动组组长赵理君。他化名赵立俊。行动组长陶士级，四川人，黄埔军校五期毕业，在上海专门负责军统行动工作，抗战期曾任军统局本部行动处行动科科长。他住在法租界霞飞路中段巷内俄国大菜馆楼上。行动组副组长克全及几个特务行动员则住在法租界迈尔西爱路一幢三层楼房内，组部也设在那里。参加这次行动的凶手6人，事前都举行了宣誓，要做到“不成功即成仁”，如不幸被捕，应即自杀，而不能泄漏出去，否则将受到严厉制裁。

特务们本来准备在17日早上动手，因为他们刚一到达中央研院附近即碰上法巡捕房一辆巡逻警车，以后又有一队换班的巡捕经过，因此不敢动手即分别溜回。18日早上6点多钟，越理君亲自带着李阿大、过得诚、施芸之等前往。赵自己坐在汽车上，汽车则停在亚尔培路、马斯南路转角处。李阿大、过得诚等四人等候在中研院附近，附近还有一个巡风登车时，特务们便走们门闪准备动手。但杨上车后又走了下来，特务还以为杨已发觉正想冲进去的时候，杨领着儿子又登上了另一辆汽车。当汽车徐徐驶出亚尔培路32号大门时，四支手枪同时朝着车内射击。

杨先生一闻枪声，立刻知道要杀害他。在这生死关头，杨杏

佛自知难逃，但因爱子心切，立刻用身子袒护小佛。所以特务们连发十多枪只将杨和司机打死，小佛仅腿部中了一弹而幸免于难。凶手们见目的已达到，便向停在附近的汽车狂奔，抢着上车。赵理君听到枪响，早已指使司机将车开动。这时过得诚因慌乱跑错了方向，等折转来再去追汽车时，车已离得很远。他一面跑一面喊：“等一等我。”越一看他还差好几丈，而这时附近警笛狂鸣，便顾不得再停车等候，因怕他被捕后泄漏消息，立刻从车上向他发射，仓惶中未能击中要害，便加足马力开车飞奔。

凶手过得诚刚完成任务，没想到反而挨了自己人一枪，他想挣扎着逃命，但四面围追过来的巡捕已接近了他。他自知无法再逃，只好举枪自杀。一弹从胸侧穿过，他虽育极倒地，却没有死去，结果被巡捕捉到，立刻与杨氏父子一同送往金神父路文慈医院抢救。

杨先生抵医院不入，即以伤重不及救治而逝世。凶手过得诚经急救之后，到下午即能说知。经巡捕房派人向他追问，曾说出他叫高德臣（参加军统后的化名），是山东人，因来沪股亲……等，但还不敢说出真实情况。

戴笠听到杨已被刺身死的消息，非常高兴，但一听到过得诚已被捕并说出了自己的化名，又非常气愤。戴马上通知在法租界巡捕房任华探目的军统特务范文珍，叫他带上一包毒药，以捕房关系去接近过。当晚，这个凶犯便也“重伤不治”而死去。第二天报纸刊出杨遇害经过时，都只提凶犯高德臣的名字，并说高在刺杨时因凶手四人相对身击，被同伙打中一枪后才被捕去云云。20日晚上，戴笠便很得意地回转南京，向蒋介石复命计赏。

戴对这个为他卖命的过得诚，除了假义地表示悲痛外，还对他的家属给以抚恤，过得诚的儿子也一直由军统负责养育。抗日战争期，戴笠曾多次以过得诚“任务完成后，无法逃走，自杀成仁”的精神来教育特务学生，并对这一祟表示赞扬。以后在重庆